

809

10207
186



卷首语

《中国学研究》经过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它是一种高档次、高品位且很严肃的学术研究专辑。当然,这类专辑的出版,如果没有国内外一些师友的积极鼓励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大力支持,恐怕是很困难的。值此,我们真诚地说声“谢谢”。

《中国学研究》所收录的论文稿件,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和宗教学等。其撰写人员一般是博士毕业或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大学教师或专职研究人员,在中国留学即将毕业的国外优秀博士生的论文也在遴选之列。稿件一般由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必要时送请有关专家预审。本专辑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创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旨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中国学研究》犹如一个窗口,为我们了解国内外“中国学”研究提供帮助。作为编撰者,我们力争办出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风格。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征集渠道还不是特别畅通,所以对有些优秀论文不能入选深表惋惜。本专辑今后将注意扩大国别区域的覆盖面,增强精品意识,多发表一些功底深厚、富有创见、新颖独特的好文章,以繁荣和发展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

《中国学研究》目前暂定为每年出版一辑,每辑20万字左右,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惠赐稿件。稿件一般限于1万字之内,并提供论文软盘和打印稿,或通过电子信箱联系。

国内联系人:吴兆路

国外联系人:甲斐胜二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邮编:200433)

通讯地址:日本〒814 福冈大学人文学部

E-mail: zlwu@srcap.stc.sh.cn

E-mail: jiafeikai@ma2.justnet.

zhaolucn@yahoo.com.cn

ne.jp



A0949441



目 录

中国学研究

(第四辑)

顾 问 王水照 潘富恩
王运熙 顾易生

主 编 吴兆路 林俊相
甲斐胜二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 杜晓勤
方 铭 甲斐胜二
林俊相 朴均雨
任元彬 孙明君
吴兆路 张 兵

执行主编 丁少伦 吴兆路
责任编辑 赵志坚 张元立
张丽霞

封面设计 侯文美
版式设计 郭建业
印刷监制 魏厚谨

- 4 论《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影响/俞樟华
- 17 六朝文体论的形成及其背景/(日)甲斐胜二
- 26 谢灵运鲍照山水诗之比较/韩文奇
- 33 《文心雕龙·章句》“明”、“局”二字训/(台)牟鑫
- 37 齐诗与汉代政治/谭德兴 杨光熙
- 43 《文心雕龙》折衷思想论/马晓坤
- 55 魏晋士人生活方式的考察/王淑芹 刘月
- 63 关于唐传奇的几个特点/(韩)姜廷锡
- 69 宋人论诗情对诗歌品质的决定作用/张思奇
- 78 朱熹探索佛道的本质/李士金 汪运平
- 85 方回志行考辨/姚大勇
- 91 《张协状元》的创作和写作年代/(韩)张丙椿
- 97 明代山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及其在文坛的影响
/郑利华
- 110 汤显祖“贵生”思想初探/(韩)崔洛民
- 123 李贽“泄愤”说的具体含义及其意义
/(韩)崔丙学
- 133 归有光文学作品思想的特征:合一精神
/(韩)朴璟兰
- 146 浅析柳如是诗歌创作的反性别特征/杨丽莹



- 156 试论李渔戏曲中的妇女形象/卢寿荣
 166 论袁枚对乾嘉诗坛的历史贡献/石玲
 178 “脂评每浅一层,本文又深一层”/程敬
 185 郭沫若自叙小说中虚构的时空
 /(日)武继平
 199 香港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文学发展概览
 /(香港)周丽娟 朱自奋
 202 “V得”后主谓结构的语义分析/范晓 张豫峰
 219 《雷雨》中二价动词的使用情况分析
 /(韩)权裕璃
 229 语境研究综述/曹京渊
 237 刘师培训诂学成就简论/王如展
 253 《黄庭坚年谱新编》献疑/崔铭
 262 评《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
 /马美信
 268 汉语语源的深层透视
 ——读《汉语语源义初探》/曾昭聪
 272 韩国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语学研究情况简介
 /(韩)孔在熙
 280 韩国著名汉学家:许世旭教授/(韩)崔宇锡
 283 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繁教授/(日)甲斐胜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研究.第四辑/吴兆路
林俊相 甲斐胜二主编. — 济
南:济南出版社,2001.5

ISBN7-80629-590-9

I. 中… II. ①吴…②林…

③甲…

III. 汉学—研究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
字(2001)第 029008 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发行电话 (0531)692207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中汇印务有限责
任公司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16.50 元

书 号

ISBN7-80629-590-9/C·13



论《史记》对古代散文的影响

◎俞樟华*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古代史传文学的典范作品,其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从唐宋八大家到明代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再到清代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首的桐城派,上下千余年的大大小小的古文家,都是高举学习《史记》的旗帜,以能写出司马迁那样的文章为荣的。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柳宗元是韩愈的朋友,他最了解韩愈的为人和文章,当时他就在《答韦珩示韩愈推以文墨事书》中说过:“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韩愈自己也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所以他作文,“上规姚姒,浑浑无涯,下逮庄、骚、太史所录”,^① 非常注意从《庄子》、《史记》等书中汲取文学滋养。在《答李翱书》中,韩愈自叙其学文经过时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金代刘壎认为,所谓三代只是一句虚话,重点是学两汉,而两汉文章的代表不出《史记》和《汉书》,所以,韩愈主要侧重学习马班文章的特点,他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那么,韩愈文章从司马迁那里究竟学到了哪些东西呢?按照古人的理解,主要有下面几点:

其一,“太史公文,韩得其雄”。这是清代文学批评家刘熙载在《艺

*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韩愈:《进学解》。



概·文概》中说的。司马迁的文章,有的如浑浩的长江大河,雄奇奔放,豪迈不羁,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有的却像微波荡漾的清池曲水,委婉曲折,平易自然,偏于阴柔之美。在史传文学研究史上,第一个用“雄深雅健”的评语来概括司马迁文章风格的是韩愈。这个概括是很准确的,司马迁笔力劲健,感情充沛,文势或大起大落,跌宕有致,或如江河浪涛,滚滚而来,汹涌不绝,给人以雄放疏荡,颇有奇气之感。韩愈的文章也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具有一种宏伟奔放、刚健奇诡的独特风格,所以后人把他这种文风的得来与司马迁紧密联系起来。白居易就在《韩愈比部郎中央馆修撰制》一文中说过:“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文之雄健,全在气势。为了使文章气势旺盛,韩愈和司马迁一样,非常注意表现方法的多样化。一是多用排比句,把同范围、同性质的事物以结构相同或相类的语句连接在一起来讲,层层深入,步步逼进,仿佛长江前浪接后浪,给人以滔滔不绝的观感。司马迁是最善于运用虚词写作的作家。继司马迁之后,韩愈最擅长此道。他为了使文势高悬,也大量使用虚词,如《祭十二郎文》、《与崔群书》等篇都是因为多用虚词而情深气沛、摇曳生姿、动人心肺的。宋代费衎曾说:“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词。其最妙处,自‘其信然耶’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凡句尾连用‘耶’字者三,连用‘乎’字者三,连用‘也’字者四,连用‘矣’字者七,几乎句句用助词矣!而反复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能及此!”^①三是发端突兀,似横空出世,先声夺人。归有光论《史记》,谓司马迁的文章“起头处来得勇猛”;^②近代李景星具体地说,《史记·西南夷列传》“传之起首,如青天霹雳,如平地奇峰,突兀得势,入后步步照应,有破竹之妙”。^③韩文也工于发端,魏禧《日录论文》就说:“韩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而刘熙载则说:“韩得史公之雄,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他们都指出,韩愈文章善于发端见奇,制造声势的特点,与司

① 《梁溪漫志》卷六。

② 刘大櫆:《论文偶记》引。

③ 李景星:《史记评议·西南夷列传》。



马迁颇多师承关系。

其二,“韩柳文法祖《史记》”。这是宋代吴子良在《林下偶谈》中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先看韩愈文法祖《史记》的情况。吴子良说:“退之《获麟解》云:‘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句法盖祖《史记·老子传》云:‘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鱼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比较这两短话的句法,真是完全一样。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在韩文中随手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如黄震说,韩愈《祭薛助教》中“有‘后三月’,此用《史记》‘后九月’文法也”。^①王若虚也说,韩愈在《薛公达墓志》一文中所谓“凤翔军帅设的命射,君三发,连三中。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呼笑”,与《史记》写陈平“从攻陈豨、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的笔法完全一致。^②金元时期的刘壘也说,韩愈的碑铭“妙处实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故未尝尊称迂、固。至其平生受用,则实得于此。”^③清代曾国藩也说,韩愈《读荀子》一文中的“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欤”等语,“衿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气类史公《年表序》”。^④这些事例说明,韩愈文法祖《史记》的话,不是一句虚言。

其三,人物传记得“龙门神髓”。在写人叙事上,韩愈也非常重视向《史记》学习,而且学得很有成就。如他的《张中丞传后叙》不仅在体例上沿用《史记》传后论体笔法,就有关《张巡传》的内容发表议论并补充一些自己采访到的史料,而且在刻画张巡和南霁云的手法上,与《史记》也很相似。所以古代评论家都认为此文作为韩愈传记作品的代表作,是深受司马迁的影响的。例如茅坤认为,韩文“通篇句、字、气,皆太

①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九。

②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五。

③ 刘壘:《隐居通议》卷十八。

④ 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引。



史公髓，非昌黎本色”。方苞则曰：“退之叙事文不学《史记》，而生气奋动处不觉与之相近。”^① 清代乾隆皇帝对《张中丞传后叙》也特别欣赏，肯定它“叙致曲折如画，真得龙门神髓，非徒形似也。”^② 韩愈写人常常能将人物写得虎虎有生气，在这一点上，与司马迁往往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毛颖传》在立意和写法上，与司马迁的传记文章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李肇的《国史补》卷下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再如韩愈的《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打破常规，刻意写了一段王适设计骗娶妻子的轶事，显得十分曲折生动，引人入胜，让人好像是在读小说一样，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写法。正因为韩愈把史传文学的笔法运用到了墓志铭的写作之中，所以他那些写得好的墓志铭，就有了传记文学价值，赢得了后人的好评。

柳宗元是与韩愈并驾齐驱的古文家，他也是非常推崇司马迁和《史记》的。他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中说：“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而武帝尤好焉，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接着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又说：“参之《谷梁传》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又说：“《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人。”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据他自己说，这种风格是从《史记》中学来的，这应该是最直接、最准确的说明。除了柳宗元自己以外，对他了解最深的韩愈也曾说过，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③ 我们今天从他的创作实践看，其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确都继承了《史记》中不少优秀的东西。如他在永州写的许多书信确实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在艺术风格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对此，前人早有认识和评论。朱熹说：“柳子

① 以上均引自《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二《张中丞传后叙》引。

② 《唐宋文醇》卷二引。

③ 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引。



厚文有所模仿者极精,如《自解》诸书,是仿司马迁《与任安书》。”^①李绂说,柳宗元的“书序论记,散体大篇,则辞气雄深雅健,诚如昌黎所云,足以追马配韩,卓然而不愧也”。^②茅坤也说,《与许京兆孟容书》是“子厚最失意时书,却写得最得意,直可与太史公《报任安书》相参,而气则呜咽萧飒矣”。^③不独风格相似,在文法上,柳宗元和韩愈一样,也是师法司马迁《史记》的。王应麟、吴子良等人就认为,柳宗元的《游黄溪记》的文法是模仿《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试比较一下,司马迁云:“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柳宗元云:“北之晋,西适幽,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泂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这两段话在介绍地理方位时所用的方法和语言,确实非常一致,师法的痕迹是极为明显的。所以近代学者李景星也有“韩退之、柳柳州、白乐天最喜仿”《西南夷列传》的写法的评论。^④

韩愈和柳宗元为什么都如此重视学习《史记》呢?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⑤可见韩、柳努力取法于《史记》,本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以复古的名义开创一种新文风,倡导一种新文体。由于他们不是机械模仿、全盘因袭,而是在学习中有所创造发明,能自成一派,所以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巨大,他们自己也成了继马班之后的最杰出的古文家,成了后代古文家师法的榜样。韩、柳是《史记》文章艺术的最好继承者,是继司马迁之后的最优秀的散文家,这是古往今来的评论家一致公认的看法。韩、柳对《史记》的大力推崇和学习,不仅使他们自己受益匪浅,而且还直接推动和影响了当时和后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② 李绂:《穆堂别稿·与方灵皋论所评柳文书》。

③ 茅坤:《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

④ 以上均引自《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四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注。

⑤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二》。



代古文家对《史记》的研习。在唐代,除了韩愈和柳宗元以外,继承史传文学笔法的古文家还有不少。如张道济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文中有云,卢思道“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职,八平除,擢迁者四而已”。高步瀛对这几句描写评论说:“总括数语以收束前半篇,此法出自《史记·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哙列传》等。”^①李翱是韩愈的高足,其散文创作在当时也很有名气。他的文章师法司马迁的地方也随处可见。如他的《题燕太子丹传后》一文,储欣就认为其中对燕太子丹的描写,是“摹子长”,即追摹司马迁的;吴汝纶也说这篇文章在写法上几乎“笔笔转,句句变,皆从空中折换,极顿挫反侧之势。是太史公神妙之境,不易到也”。^②

司马迁的《史记》到了宋代,获得了更大的好评和更广泛的师法学习。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出现在宋代,他们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六位杰出的古文家与韩柳一样,都是非常推崇《史记》,并努力师法《史记》的。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也是著名的史学家。他的《新五代史》得力于《史记》甚多,被后人认为是历代史传作品中学《史记》学得最好的,如罗大经就说其书可以“与司马子长并驾”,^③吴德旋也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④尤其是《新五代史》中的《伶官传序》,简直就是司马迁的手笔,沈德潜说它“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⑤林西仲说它“其行文悲壮淋漓,可与子长、孟坚颉颃”。^⑥当然,作为古文家,欧阳修的突出成就还是在散文方面。苏洵说他的文章“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而欧阳修那种纡余委备、自然流畅的风格,正是从《史记》发展而来的。清人刘熙载曾指出,太史公文,“欧得其逸”,“逸者善

① 《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一。

② 《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五引。

③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

④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

⑤ 《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十四。

⑥ 《古文笔法百篇》引。



用纾徐,故引绪乃覩入妙”。^①这个评论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明代的艾南英遂将欧阳修与司马迁、韩愈并称为古文三大家,还盛推欧阳修为《史记》之嫡子,即司马迁最好最理想的衣钵传人。他在《天庸子集·与友人论文书二》中说:“千古文章,独一史迁。史迁而后,千有余年,能存史迁之神者,独一欧公。”欧阳修除了叙事风格酷似太史公笔法之外,他的人物传记也是很注意潜心学习《史记》的。他在写《桑怿传》时曾对此作了专门说明:“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乃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怿所为壮矣,而不知予文能如迁书使人读而喜否?”在这里,欧阳修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很爱好司马迁的人物传记作品,不仅喜读不厌,而且“欲学其作”,《桑怿传》正是“欲学其作”的产物之一。传文以桑怿捕盗为中心组织材料,通过桑怿智擒盗墓者、入深山招抚占山为盗的王伯、化装捕捉二十三名惯盗,以及功成而不赏等几个生动奇特的情节故事,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品行高节的神捕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为了突出中心,欧阳修甚至连桑怿在抵抗西夏战斗中为国捐躯这样壮烈的事迹也没有写。这种做法,显然是继承了司马迁的写人风格。

欧阳修师法司马迁,不仅自己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影响了当时的古文家。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他为文也远宗司马迁、韩愈,近学欧阳修,一时文名极盛。《宋史》本传说他的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曾巩对司马迁和《史记》一向都是很重视的,这从宋人王正德《余师录》所记的一则轶事中可见一斑:“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陈师道自幼即读《史记》,对《史记》不可谓不熟,曾巩还要他放弃它书,再专心致志地攻读《史记》两三年,直

^① 刘熙载:《艺概·文概》。



到心领神会,写出近似司马迁《史记》那样的文章后,才心满意足,予以肯定。从这则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曾巩对《史记》的极大重视和注意学习,而且可以看到宋代其他古文家对《史记》的殷勤师法学习。至于三苏与《史记》的关系和所受到的深刻影响,笔者已另撰有《三苏与史记》一文,^①在此从略。在唐宋八大家的倡导和影响下,《史记》在唐宋时代的地位很高,推崇它、学习它的古文家很多,对后代也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宋代以后,《史记》对散文发展的影响继续扩大,尤其是明代,以前后七子、李贽、归有光为首的唐宋派和公安派都很推崇《史记》。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十分推崇太史公,但是他们走上了盲目尊古、拟古的错误道路,是不足取的。归有光是明代文章巨匠、唐宋派的代表,他反对盲目崇古、拟古,主张既要学习前人,又要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五岳山人前集序》中说:“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万分之一,然不喜为今世之文,性独好《史记》。勉而为文,不《史记》若也。”又在《陶庵记》中说:“余少好司马子长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可见《史记》对他的影响有多么深刻。所以近代林纾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说他“穷老尽气,但抱一《史记》;而于《史记》中尤精于《外戚传》,所以叙家庭琐事,入细入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说归有光为文而“好太史公之书,能得其风神脉理”。黄宗羲则指出,归有光“之所以见重于世者,以其得史迁之神也”。而归有光自己则认为,知道“《史记》之所以为《史记》,则能《史记》矣”。他的《评点史记》,从研究文章的结构、形式和技巧出发,探讨了《史记》文章的写作特点,开创了品评分析《史记》文章艺术的先河。在他的带动下,唐宋派几位骨干分子都对《史记》十分倾倒,不仅深入研究《史记》,留下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著作,而且个个身体力行地师法《史记》,并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如茅坤的《史记钞》,评史论文,常能深挖作品的文心奥秘,揭示文章的写作特点,是一部研究《史记》艺术成就的很重要的著作。因为茅坤对太史公的文章体会颇深,所以学习也颇为到家,钱谦益曾高度评价说:“(其)为文章滔滔莽莽,谓文章之逸气,司马子长之后千余年而

^① 见《史记新探》,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得欧阳子,又五百年而得茅子。”^①把茅坤的文学成就与司马迁和欧阳修相提并论,这似乎有些过分,但它至少说明茅坤在师法司马迁方面,的确是下了功夫,颇有成效的,否则不可能这样受人称赞。不过明人在师法《史记》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病。由于明代复古思潮严重,一味师古的结果,不仅没有把古代文学的精华学到,反而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和特点。屠隆就对当时这种不良风气提出过批评,他在《文论》中指出,当时人“学《左》、《国》者得其高峻而遗其和平,法《史》、《汉》者得其豪宕而遗其浑博;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也”。深陷复古泥潭之中,必定失掉自家本色,这是没有出路的。事实上,在有明一代的文坛上,尽管作家众多,作品如林,可是并没有出现像唐宋八大家这样的大家,更不用说像司马迁这样的天才了。其实,要真正学到马班文章的精华,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何良俊就说过:“今之作文,动辄便言《史》、《汉》。夫《史》、《汉》何可以易言哉!昔人谓韩昌黎力变唐之文,而其文犹夫唐也。欧阳公力变宋之文,而其文犹夫宋也。岂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汉》耶?盖我朝相沿宋元之习,国初之文,不无失于卑浅。故康、李二公出,极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发以西北雄俊之气,当时文体为之一变。然不过为我朝文人之雄耳。且无论韩昌黎,只如欧阳公《丰乐亭记》中间,何等感慨,何等转换,何等含蓄,何等顿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论《史》、《汉》哉!”^②在何良俊看来,就是韩愈、欧阳修等人,他们学马班文章都还没有真正到家,至于康海、李梦阳等人,虽说在明代可以称雄一时,可是他们的作品连欧阳修都比不上,又如何能去与马班的文章较量长短呢?话里有点伤心,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清代对史传文学最重视的是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首的桐城派。桐城派弟子众多,遍及大江南北,活动的时间又几乎与整个清代相始终。方苞是桐城派之祖,在七岁就“潜观”《史记》,以后又撰有《史记评语》、《史记注补正》及一些单篇读史笔记,是桐城派中对《史记》最熟悉、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②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三。



最有发言权的人。他为文讲究义法,而“义法”二字最早是由司马迁提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孔子《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对“义法”二字作出具体的解释。方苞是对“义法”说作详细论述的第一人。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一文中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他认为“义法”二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说内容,一讲形式,两者紧密结合,自然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来。因为“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①所以他主张把《史记》的“义法”引到古文写作的实践之中,提倡向《史记》学习作古文的方法。他的这个主张,曾得到了桐城派其他诸位大家的响应。如吴德旋认为,学古文“必慎其所入之途,不慎而后悔焉,旧染之习未易忘也”。那么,怎样学习呢?“上者自司马子长、韩退之人,其次自柳子厚、王介甫入,又其次自归熙甫、方灵皋入。自子长、退之人者,长于奇变,然虑其形具而神不属也;自子厚、介甫入者,长于幽邈,然虑其多为作而晦且诡也;自熙甫、灵皋入者,长于浑朴,然虑其狃于近而识不远也。”^②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认为:“文之义法,至《史》、《汉》而已备;文之体制,至八家而乃全。”所以他主张学习古文的顺序,应该先从唐宋八大家人手,然后上推至司马迁和班固的文章。他说:“善学文者,其始必用力于八家,而后得所从入其中,人进之以《史》、《汉》,而后克以有成。”梅曾亮《复陈伯游书》说他自己“少好骈体之文”,后来才“始觉班、马、韩、柳之文为可贵”,所以就改弦易辙,开始向马班文章学习。为了使时人学习有法可循,桐城派特别推崇明代归有光对《史记》的圈点。如姚鼐《答徐季雅书》就认为:“震川阅本《史记》,于学文者最为有益,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归有光在评点《史记》时,把司马迁文章的精彩之处都作了圈点提示,使初学者一看就知道文章的好处在哪里,应该从中学些什么。姚鼐还继承归有光圈点《史记》的传统来圈点《古文辞类纂》,以便给入学古文提供指导帮助。

① 方苞:《古文约选序例》。

② 《初月楼文钞》卷二。



桐城派大力提倡学习太史公笔法,曾取得了很出色的成就。这里我们试以戴名世和刘大櫟为代表来说明这个问题。戴名世是桐城派的先驱之一,他比方苞略早,对方苞的古文曾有过不小的指导。由于他因“《南山集》案”被清朝统治者所杀,所以后来的桐城派弟子就很少提及这位桐城派先辈了。近年来学术界拨乱反正,对戴名世在桐城派的地位和贡献作了重新评价,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戴名世夙以马班自命,以撰写“成一家之言,与《史记》、《五代史》相颉颃”^①的明史为终身奋斗目标,所以他不仅具有“盲左腐迂之识”,^②而且是属于“有子长之才,不能成子长之志”^③的史学家。就古文而言,他受司马迁的影响也很深,他自己就在《答张氏二生书》说过:“不佞自初有知识即治古文,奉子长、退之为宗师。”又在《与王云涛书》说:“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书》,亦欲有所撰著。”《清史稿》本传也说他“喜读《太史公书》”。因为他对司马迁和《史记》好之很深,所以师法也就非常到家,如王哲《重订南山集序》说戴名世“所作古文,直追龙门,而气魄雄厚,有过之无不及也”。戴钧衡也认为戴名世文章“其气之逸,韵之远,则直入司马子长之室而得其神”。这样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刘大櫟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又一位宗师,他也是司马迁的崇拜者,曾在《论文偶记》中对《史记》的艺术作过很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史记》有“大、远、疏、变”等特点。他的古文写作受司马迁的影响也非常巨大,我们从欧阳霖和高肇麟合编的《海峰文集》中的评点里,可以见到许多将刘大櫟的文章与《史记》进行比较评论的文字,如说他的《书战国策后》“神韵高古似《史记》”,《删录荀子序》“用笔以拙为工,而神韵高古,是学《史记》之文”,《司湘灵诗集序》“摹写淋漓,风神道逸,似司马子长”,《义士吴君传》“直叙三四事,扫除枝叶,独存老干,神味似《史记》”,《吴节妇传》“写出闺阁幽隐人情所难言处,使人如见,得史公神髓”,《方氏节母传》“叙事独得史公之峻洁”。此类评论甚多,评点者从叙事笔法,到语言风格,再到人

① 尤云鹗:《南山集跋》。

② 方正玉:《子遗录序》。

③ 戴钧横:《编潜虚先生文集目录叙》。



物传记的描写艺术,将刘大櫟所受太史公影响的方方面面,都逐一指了出来。尽管这样的评论还比较简单,甚至有些牵强,但仍可证明,刘大櫟的文章的确是师承太史公的。

在清代,除了桐城派之外,爱好史传文学,提倡潜心师法学习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章的文人学者还有很多。比如徐邻唐认为,古文“法莫具于马迁,前此之文,马迁不遗;后此之文,不能遗马迁”,所以他提出了“文必学马迁”的主张。戴震是清代著名的学者,他就十分喜欢《史记》,并学有成效。段玉裁在《戴东原年谱》中说:“先生少时学为古文,摘取王板《史记》中十篇,首《项羽本纪》,有《信陵君列传》、《货殖列传》,其他题记忆不清,皆密密细字,评其结构、用意、用笔之妙……书犹在也。”他在评点之余,也用心学习太史公的为文笔法。如写《勾股割圆》这几篇算学著作时;当他写完其中的两篇后,觉得“下篇难作,却取太史公《信陵君列传》玩味一番”,然后就顺利写成了。写数学著作也可以从司马迁那里学到有益的东西,可见《史记》的影响之大,这也说明清人是多么善于学习史传作品了。清初学者黄宗羲也主张学习马班的传记文章,他在《高旦中墓志铭》中说:“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舍是则旁蹊曲径矣。有明之得其路者,潜溪、正学以下,毗陵、晋江、玉峰,盖不满十人耳。”人们一般都强调立身要正,黄宗羲更是强调为文也要走正路,而向《史记》、《汉书》以及韩愈、欧阳修的文章学习,就是正路,这种观点是很有新意的。吴仲伦也曾明确地提出:“《史记》、两汉、三国、五代史,皆事与文并美者,其余诸史,备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观也。”^①在他看来,如果要学史传作品,那么只要去学前四史及《新五代史》就够了,至于其他各史,因为文章写得不好,只能聊备一查罢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评价也是符合史传文学的实际的。这也难怪明清时代的文人都把评论和学习的重点放在前四史上了。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散文家一致公认的宗师,是历代古文家师法学习的榜样;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

^① 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



《史记》曾经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古文家；历代大大小小的古文家，几乎人人都受到过司马迁和《史记》的影响；司马迁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崇高而又不朽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六朝文体论的形成及其背景

◎(日)甲斐胜二*

—

中国文论从古代到当代产生过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理论,特别是六朝时产生了一些很有趣味的文学范畴,如文气论、文质论、风骨论、声律论等等。今天我在此要讲的文体论(或者说文章流别理论),当然也是其中一种。这一理论,依我看,可以说是萌芽于东汉,到了齐梁时代的《文心雕龙》、《诗品》时期,其理论体系已基本完成。

文体论有两种特色:其一是着重把历代文章从其样式、特征方面汇集起来进行详细分类,然后分析出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及风格,进而规定其文章的体裁;其二是对各种文体溯源。这时候撰者大都尽量要追溯到传统权威的《五经》或者《五经》中能看到的情志上去。例如《文心雕龙》上篇二十篇的文体论,一般是开篇首先用声训来讲该文体的基本特色,篇中例举一些文章,分析历代文章的得失,篇末详细地述说其文体特有的风格和特征,而对此进行分析的文体,其源头差不多都和《五经》有关系。所以刘勰认为这些文体都是由《五经》产生出来的。《诗品》虽然只讲五言诗的特征,评论作五言诗的诗人,但里面同样能看出有和《文心雕龙》类似的观点。《诗品》里讲到的诗人、诗风都被溯源到《诗经》和《楚辞》。不过,《诗品·上品序》讲到诗的发生时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祈待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明确把《礼

* 作者系日本福冈大学教授。本文是1992年在桂林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上的报告文稿,在此发表时个别地方作了修改。